

晚清英語教材研究：以光緒和宣統皇帝英語學習為例

黃萍萍 *

摘要 光緒帝是清代第一位正式接受英語教育的皇帝，對英語學習有極高熱忱；宣統帝溥儀聘請英國人莊士敦擔任帝師學習英語也從未有過先例。從教學方法和教材的使用來看，光緒帝的英語學習較為正式與系統，但缺乏了解外界資訊的渠道；宣統帝溥儀則較為隨性散漫，卻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領域的原版報刊、雜誌，這些英語素材都成為了他認識西方世界的重要途徑。當前學界以英語作為二語／外語的學習理論主要以西方應用語言學理論為根基，並非扎根於中國本土土壤。皇帝作為特殊的英語學習者，研究其英語教材的使用與英語學習情況對於了解中國英語教育發展有特殊意義。

關鍵詞 英語教材；英語教育；光緒；溥儀；商務印書館

引言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洋務運動興起，恭親王奕訢奏請開辦外語學館，京師同文館隨後於1862年創辦。中國近代正規的英語教育始於京師同文館的建立。在此之前，出於域外語言翻譯的需求，明朝曾設立“四夷館”，清朝則設立“四譯館”，後又將四譯館併入會同館，更名“會同四譯館”。明朝的四夷館雖然設有十大語言館（韃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百、暹羅），但以少數民族和中國鄰國語言為主，尚未涉及英、法、德、俄等西方國家外語翻譯。康熙或許是中國首位意識到培養中西（中俄）雙語翻譯人才重要性的皇帝。清廷曾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後又在雍正五年（1727年）簽訂了《恰克圖條約》，其間隨着中俄關係發展創辦了俄羅斯文館。¹雖然隨着中外交流的增多，清朝開始有意識地培養中西雙語人才，但皇帝自身的語言學習仍以滿、蒙、漢語為主，並不涉及西語學習。當時朝廷內仍以“天朝上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自尊，

認為皇帝學習“蠻夷語言”有失身份。光緒帝是清代第一位正式接受英語學習的皇帝，對英語學習有極高熱忱，並由張德彝和沈鐸為其授英文課。²光緒帝學習英語的動機與當時清廷在中外戰爭中的連連失敗、洋務運動的興起，以及部分有識之士倡導學習西方，改革政治、教育體制來挽救中國等政治歷史背景有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宣統帝溥儀聘請英國人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擔任帝師學習英語也從未有過先例。有關晚清時期諸多政治、經濟、歷史背景，在此不再過多贅述，本文旨在以晚清英語教材為視角，了解二位皇帝的語言學習情況。

當前以英語作為二語／外語（English as a second / foreign language）的學習理論主要以西方應用語言學理論為根基，語法翻譯法、任務型教學法以及交際法等英語教學方法都是基於外國的理論發展而來，並非扎根於中國本土土壤。晚清時期的英語教育尚處於萌芽階段，但仍能培養出諸如嚴復等優秀的翻譯家、教育家，其教材與教學方法必有可取之處。而皇帝作為特殊的英語學習者，不論是師資還是教材資源配備均需經過嚴格篩查，因此研究其英語教材與英語教學情況對於了解中國英語教育與教材的發展有特殊意義。有關光緒皇帝和

* 黃萍萍，北京外國語大學專用英語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語教育、教材研究、課程、教學法與語言測評。

溥儀學習英語的記述十分零碎，其中關於英語教材的資料大多只記錄書名，許多細節有待考究。筆者通過蒐集文獻，力圖為光緒和宣統兩位皇帝的英語學習概況和相關教材的面貌呈現更多有價值的細節。

一、光緒帝英語學習概況

光緒帝正式學習英語的時間大約有三年，始於1891年底，止於1894年底慈禧太后傳令“滿功課及洋字均撤”。³其間，張德彝和沈鐸擔任英語教師每隔一日輪流給光緒帝上課。光緒帝的英語學習是其主動要求，而非被迫接受。《翁同龢日記》中曾記述帝師翁同龢在光緒十七年十月廿五日（1891年11月26日）“聞（皇上）欲通泰西字義……”⁴。德齡在《清宮二年記》中提及“皇帝即問我父親能否講法國語……”⁵，可見光緒帝學習外語的積極性很高。根據史料記載，光緒帝一般情況下都能堅持準時上課，很少缺席。⁶慈禧太后撤銷光緒帝的英語課後，他仍然堅持以非正式的方式學習英語，包括自學以及向專業人士請教，例如康有為弟弟康廣仁以及德齡均教導過光緒帝英語。有關光緒帝英語學習的成效，德齡在《清宮二年記》中提到：

我每天早晨碰見光緒皇帝。他常常趁我空的時候，問我些英文字。我很驚奇他知道的字這樣多……我們常常談到西方文明，我很驚異他對於每一事物懂得那樣透徹。

我們談了好一會，所談的大多是關於外國的風俗習慣的。

夏天我比較空閒，每天能有一個鐘點的時間替皇帝補習英文。他很聰明，記憶力又驚人的強，所以進步很快，然而他的發音卻不很正確。不久他就能夠閱讀一般學校英文讀本中的短篇故事了，而且能夠默寫得很好。他的英文字寫得非常美麗，對於古字、美術字等尤為擅長。

接着又向皇帝皇后話別，皇帝只搖着頭用英文祝我們幸福……⁷

從德齡的敘述中可知，光緒帝總是主動請教英語，雖然發音不太準確，但詞彙量比較大，能閱讀英語短篇故事、默寫，能在具體情境下用英語進行簡單的對話，例如在話別時用英文表達祝福，英文書寫十分美觀，並且對西方的文化與文明有一定了解。由此可見，光緒帝的英語學習不僅涉及語言本身，如拼寫、發音、語義等，還涉及該語言相關的國家文化、文明以及書法（書寫藝術）。筆者認為，光緒帝英語發音不準的原因一是由於當時科學技術有限，學生所用教材均以文本形式呈現，缺乏聽力、口語等音頻、視頻材料輔助學習；二是光緒帝作為皇帝身份的特殊性，其英語教師礙於皇帝之尊，不能如實糾正發音；三是光緒帝缺乏與外界直接溝通的機會。雖然光緒帝有機會接觸到外國來使，但其一言一行時刻受到慈禧太后的監控，所有的對話需經中間人（如翻譯人員）傳達，且在公開場合進行，缺少私下直接交流。該情況在《清宮二年記》中有詳細記述。

筆者尚未發現光緒帝的英語教師是否有為其制定專門的英語學習大綱的相關史料。彼時，京師同文館於光緒二年（1876年）正式頒佈《八年課程表》。《八年課程表》首年要求“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第二年“講解淺書、練習句法、翻譯條子”，第三年“講各國地圖、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⁸由此可見，前三年的大綱注重英語的認字、寫字、短篇文選、各國地理和歷史，而從光緒帝英語學習成效來看，他恰好在英語詞彙、閱讀、書寫以及對西方文明的了解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礎。鑑於其兩位英語教師均出自京師同文館，光緒帝雖然不是京師同文館的學生，但其英語學習或間接受到京師同文館《八年課程表》的指引。

二、光緒帝所用英語教材

在學習英語的三年中，光緒帝所接受的英

故宮遺事

語教育是較為規律、正式且有規劃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清宮內務府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和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呈進書籍檔”，即內務府為光緒皇帝購置書單的記錄，當中顯示光緒皇帝在交給內務府的目錄中提到：

近來商務印書館分館又有新印各書，一併購呈。每種四部。《瀛寰全志》一冊、附圖一冊，《萬國史綱》《英華大辭典》《帝國主義》《歐洲新政史（下冊）》《高等學堂中國》《西洋歷史教科書》《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華英進階全集》《和文漢譯讀本》。⁹

從光緒帝的言辭來看，他對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情況頗為了解。光緒帝在“呈進書籍檔”所提的書目有三部是由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語教材，分別是《英華大辭典》《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華英進階全集》。其中，《華英進階全集》包括《華英初階》與《華英進階》，該教材編排系統，由淺入深，是真正意義上的“教科書”；《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和《英華大辭典》為雙語辭典，屬於字典類工具書。帝師張德彝還編撰出版了《英文話規》，屬於語法解析類工具書。這些教材均為當時具有影響力、學貫中西的專家所編著。

（一）張德彝與《英文話規》

《英文話規》（*Grammar*）是近代最早由中國人編寫的英文文法書之一，成稿於1895年。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普通古籍閱覽室現藏有該書一冊。該書的編者張德彝是光緒帝的英文老師，亦是京師同文館首批優秀畢業生。該書在英語語法概念的翻譯和解釋上有別於現今通用的叫法，有其創新與特色。

邱志紅曾對《英文話規》作過概述。¹⁰《英文話規》以英語詞性為綱，通過講解英語的九類詞性的用法，使讀者窺見英語語法的全貌。張德彝富有創造性地將名詞、形容詞、代詞、連詞等譯為“實字”“指實字”“替實字”“承轉字”等（見表一），更為直觀地傳達了不同詞性的含義與關聯。例如，將“形容詞”與“代詞”譯為“指實字”與“替實字”，直接從字形字義上表達其與“名詞”（實字）之間的關係。形容詞常用來描寫或修飾名詞，即“指實字”；代詞在句中起替代作用，避免重複，即“替實字”。同理，副詞通常用來修飾動詞，將“副詞”譯為“指動字”更為直觀地表示其與“動詞”（動字）的聯繫。“連詞”的譯法只說明了“conjunction”用來連接詞與詞、句與句的功能，卻無法表達承接、轉折（如but）等邏輯關係，而“承轉字”的譯法卻能體現這種關係。

表一. 張德彝《英文話規》詞性翻譯

序號	英文	通用叫法	張德彝《英文話規》
1	article	冠詞	分指字
2	noun	名詞	實字
3	adjective	形容詞	指實字
4	pronoun	代詞	替實字
5	adverb	副詞	指動字
6	verb	動詞	動字
7	preposition	介詞	接連字
8	conjunction	連詞	承轉字
9	interjection	感歎詞	發語字

張德彝在《英文話規》的序言中寫道：

嘗思天下百工，不以規矩，工不能成，是循規蹈矩，其成工必精也，即西國之文字語言亦爾。字、句，皆有成規，措置稍乖，義必相反……罕有譯及話規者，前汪芝房星使著《英文舉隅》一書……尚不宜於初學。余因不揣簡陋，復將英文話規仔細詳參，寫以俚句……竭力就簡刪繁……¹¹

從序言中可知，張德彝對英語的語法有自己獨到的體會和見解，他以孟子“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道理解釋了為甚麼要學語法，倘若不能掌握好語法、構詞成句的規則便無法正確理解語義。同時也闡明了當時流行的語法書《英文舉隅》由於語言晦澀不適合初學者，以及編寫《英文話規》的初心便是利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語法規則，更好地為初學者服務。有趣的是，《英文話規》在編排上雖然條例清晰，在措辭方面也以白話呈現，便於初學者掌握知識，但卻沒有設置相應的語法練習。¹² 由此可見，當時的英語教材設計以知識的梳理、講授與傳遞為主，教材編者對知識掌握程度的檢測、評估意識不高。此舉或是由於彼時英語尚未與升學、就業、考試直接掛鉤，其學習目的並非為了通過某項英語測評。

（二）商務印書館與《華英進階全集》 《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英華大辭典》

1. 《華英進階全集》

商務印書館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1900年6月19日）刊登過一則“重印《華英進階全集》”的《申報》廣告，現節取部分內容如下：

是書華英文字並列，句讀明顯、釋解詳盡、久已風行宇內。凡中外之書院學堂皆藉以教授生徒，均稱受益……茲將《華英初階》和《進階》初、二、三、四、五

集合定成一大本……每大本實洋二元二角半……¹³

從廣告內容可知，《華英進階全集》（*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s: From Primer to Fifth Reader*）是《華英初階》（*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和《華英進階》（*English and Chinese Reader*）兩套教材的合編本。《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深受歡迎，至民國時期仍然不斷再版，可見當時已掀起學習英語的熱潮。其初版時間尚有爭議，目前一般認定為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該教材甚至在1946年仍在重印，中國國家圖書館就收錄了一版1946年的《華英初階》縮微文獻。

《華英初階》與《華英進階》屬於從國外引進的編譯教材，該書的中文序言中提及該教材原為英國人為印度殖民地編寫的英語入門教材，考慮到印度教材對於中國學子適用性問題，商務印書館邀請謝洪賚對其進行編譯、註釋，廣受歡迎。封底的《重譯者識》節錄如下：

當中外交通之始，華人士之治英文者殆莫不取資於印度文學會所著之讀本。本館曾取以譯漢刊印問世。書成未幾風行一時……顧其書專為印度人而作，凡所稱述或未必盡合於吾中國之學子。今更將全書量為修改。凡專為印人說法者，悉數刪汰。其他譯註亦靡不審慎周祥，務求與原文相合，於讀者有迎刃之益，刪繁補缺，蔚為大觀……¹⁴

《華英初階》共48頁，包括英文序言（含“Plan of the Book”及“Directions to the Teacher”兩個部分）、英文字母表及書寫（Alphabet）、英文拼寫、課文、宗教課文，最後附晨禱文、日禱文、晚禱文。每篇課文講解由單詞、詞組和短句構成，附中英對照。《華英初階》第4頁有專門的英文書寫示範與指導（圖1），¹⁵ 德齡曾提及光緒帝英文書寫十分美觀，可見當時的外語教育也十分注重書寫的教導。

故宮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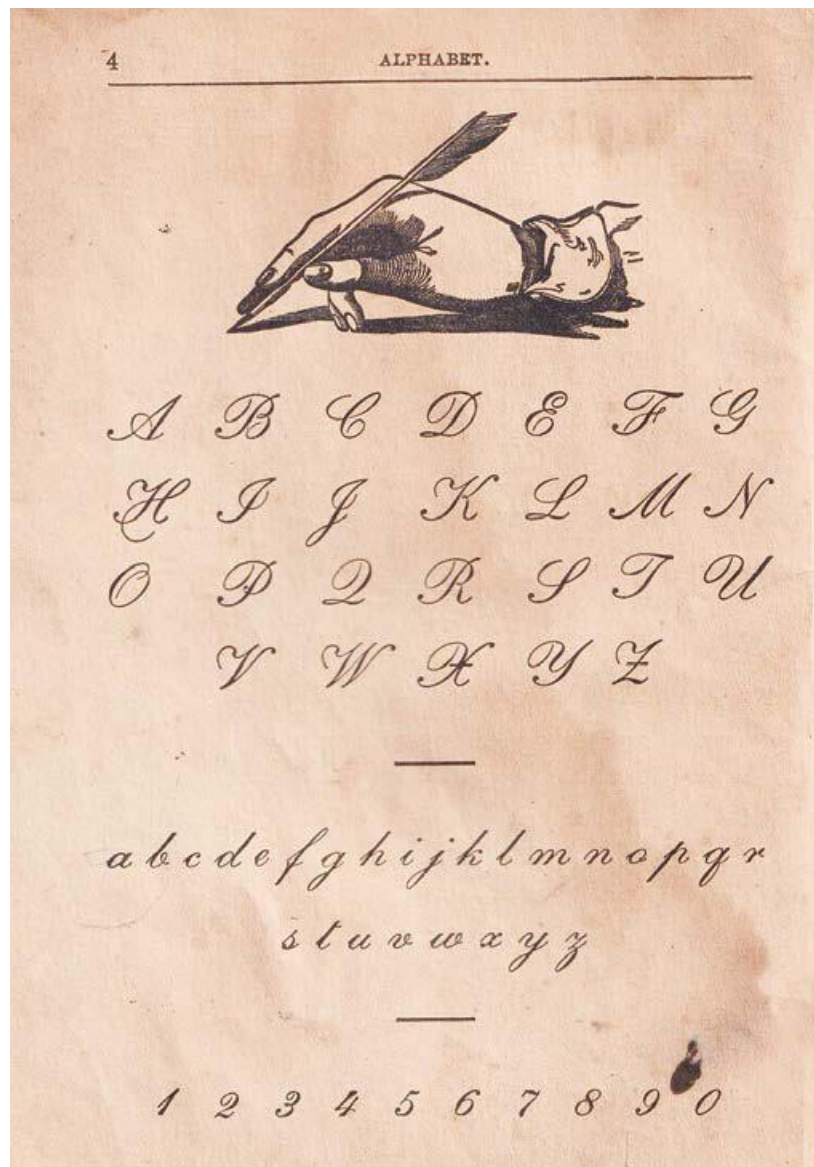


圖 1. 英文書寫指導（圖片來源：1927 年版《華英初階》第 4 頁，筆者自藏書。）

《華英初階》作為針對英語初學者的教科書，其內容編排與如今常見的英語教科書十分不同。現今針對初學者的外語教科書普遍以語言功能為導向，例如如何用英語問好、道謝、購物等，但《華英初階》是以單詞的拼寫難度與發音進行編排，例如先學習由兩個字母組成的單音節單詞，比如“so” “go” “me” 等，再學習由三個字母

組成的短元音單詞，如“fan” “pen” “lip” 等。並且，教材通常會將字形相似的單詞排列一起便於學生辨認和區分，例如“came” “game” “lame” “name” “same” 等。此舉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盡快而有效地掌握英文閱讀能力，即“識字、認字”，與現今流行的語言交流功能導向不同。

《華英進階》有初、二、三、四、五集，共六冊，書中涵蓋序言《給教師的建議》（“Directions to the Teacher”）、目錄、課文、附錄（主禱文、飯前禱文、飯後禱文）、版權頁、封底序言。《華英進階·初集》在序言中分別在朗讀（發音）、詞彙課、測評、拼寫、訓練記憶、宗教課六個方面為教師教學提出建議。與《華英初階》相比，《華英進階》的課文內容不再停留在詞組和短句方面，而是由英文短篇構成，包括寓言故事、自然知識、人體構造、日常生活等，每篇課文的標題有中英兩種文體。初、二、三集課文以“養道德”和“啟知識”為主，四、五兩集的課文選取注重“明學（哲）理”和“助興趣”，具備了“跨學科”學習的雛形。部分課文也從實用性角度出發，給予指導，例如《華英進階·三集》第108課的課文《書信》（“Letters”）指導學生如何用英文撰寫書信申請入讀學校，向書坊購買書籍，遭遇信札誤遞如何修函申明等。¹⁶

謝洪賚因其個人的宗教信仰，將禱告文引入教材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從《華英初階》與《華英進階》的內容銜接來看，這套教材在為初學者打好語言基礎的同時，也十分注重道德、思想、價值觀方面的引導，不僅教導語言知識，更注重給予文化價值。在思考如何將“立德樹人”與外語教材相結合方面對今人具有啟發意義。

2. 《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與《英華大辭典》

《華英音韻字典集成》(*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初版時間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由盛宣懷題字，原著者為德國傳教士羅布存德（Wilhelm Lobscheid，又稱羅存德，1822—1893）。該字典收錄約十萬詞彙語彙，包含翻譯、發音、語源、概念解釋以及插圖等。商務印書館又邀請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為字典作概述，他在概述中表示希望光緒帝能效仿康熙帝組織編撰《康熙字典》那樣支持中外文字典的編撰工作：

The first is my great hope that the present emperor of China will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illustrious emperor Kanghi in literary activity and among other works prepare a foreign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orthy of the present times.¹⁷（筆者譯：首先我非常希望現在的中國皇帝能在文學與其他作品方面效仿偉大的康熙皇帝，編寫一本不愧於當今時代的中外辭典。）

羅布存德所編撰的《英華字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配有國語和粵語發音，是最早在香港出版的雙語字典。¹⁸ 辜鴻銘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序中，介紹了羅布存德編撰的《英華字典》、鄺其照（Kwong Ki-Chiu）編譯的《華英字典》和《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之間的淵源。彼時，市面上流通有適合外國學生學習中文使用的英漢字典，但針對中國學生學習英語使用的雙語字典卻鮮有人關注，唯獨鄺其照曾編輯《華英字典》以滿足需求。據辜鴻銘所述，鄺其照所編的字典是以羅布存德的字典為基準，從中摘錄編譯而得，但羅布存德的編著有許多瑕疵，存在詞不達意的現象，尤其是在粵語白話的語境下並不合邏輯和語言規範，例如將“Demigod”（半神）不恰當地譯為“半個上帝”，但是這些謬誤並沒有在鄺其照的版本中得到糾正。商務印書館為此傾注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糾正羅布存德版本的錯處，以期向大眾提供一本既全面、可信度又高的字典。在看到《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樣本時，辜鴻銘認為與鄺其照的版本相比，有顯著的進步（decided advance），並且應該完全取代鄺其照的版本（...should certainly supersede it）來滿足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的需要。¹⁹

三年後，商務印書館於1905年夏天與顏惠慶達成共識，決議出版一本新的英漢詞典，即《英華大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根據《英華大辭典》

故宮遺事

編輯團隊在序言中所述，雖然當時市面上已有《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在售，但隨着中國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的進步以及許多新術語的出現，亟需一部更全面、涵蓋更多詞彙的辭典問世以滿足需求。起初，商務印書館計劃將《韋柏士特大辭典》（又稱“韋氏大詞典”，*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翻譯成中文，經過短暫的試驗，這個計劃被終止，因為《韋柏士特大辭典》體量過於龐大，為了確保字典的銷售價格足夠親民，出版社最終決定以英國《納韜而字典》（*Nuttall's Dictionary*）標準版作為基礎改譯，有不完備的地方，再從《韋柏士特大辭典》補錄，編譯過程中涵蓋《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大量例句，從《韋柏士特大辭典》中新增幾千個單詞及其例詞、例句，並根據《韋柏士特大辭典》的體系重新編排幾乎所有詞彙的註解。²⁰ 因此《英華大辭典》可視為《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的增

補版和修訂版。

《英華大辭典》包含約 12 萬單詞與詞組，並附有相應的翻譯、讀音、概念、圖像解釋等等，一套兩冊。除了總編輯顏惠慶，《英華大辭典》的編輯團隊還包括其他 16 位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或上海約翰書院的副編輯（見表二）。由於辭典所涉及領域的詞彙龐大，而當時許多科學、文藝等領域的英文詞彙沒有相應的中文與之對應，為了保證科學性與嚴謹性，《英華大辭典》的釋義還參考了嚴復（Yen Fuh）和伍光建（Woo Kwang-kien）的譯著、《英和字典》（英文與日文雙語辭典）、江南製造局（Kiangnan Arsenal）編寫的術語表，以及中國教育會（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博醫會（The Medical Association）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中文勘定由袁竹一先生主持，英文訂正由其留學美國的妹妹慶蓮負責。

表二.《英華大辭典》副編輯名單

畢業院校	姓名	字 / 號
上海約翰書院	嚴鶴齡	侶琴
	徐善祥	鳳石
	俞慶恩	鳳賓
	趙國才	月潭
	周貽春	寄梅
	曹慶五	延生
	陳達德	峻鄉
	謝昌熙	儲臣
	周森友	/
	徐銑	閏全
	張文廷	鏡人
	吳遵瀚	尊翰
	陳蔭明	芷蘭
香港皇仁書院	王勳	閣臣
	李建楨	爵五
	曾汐湖	穫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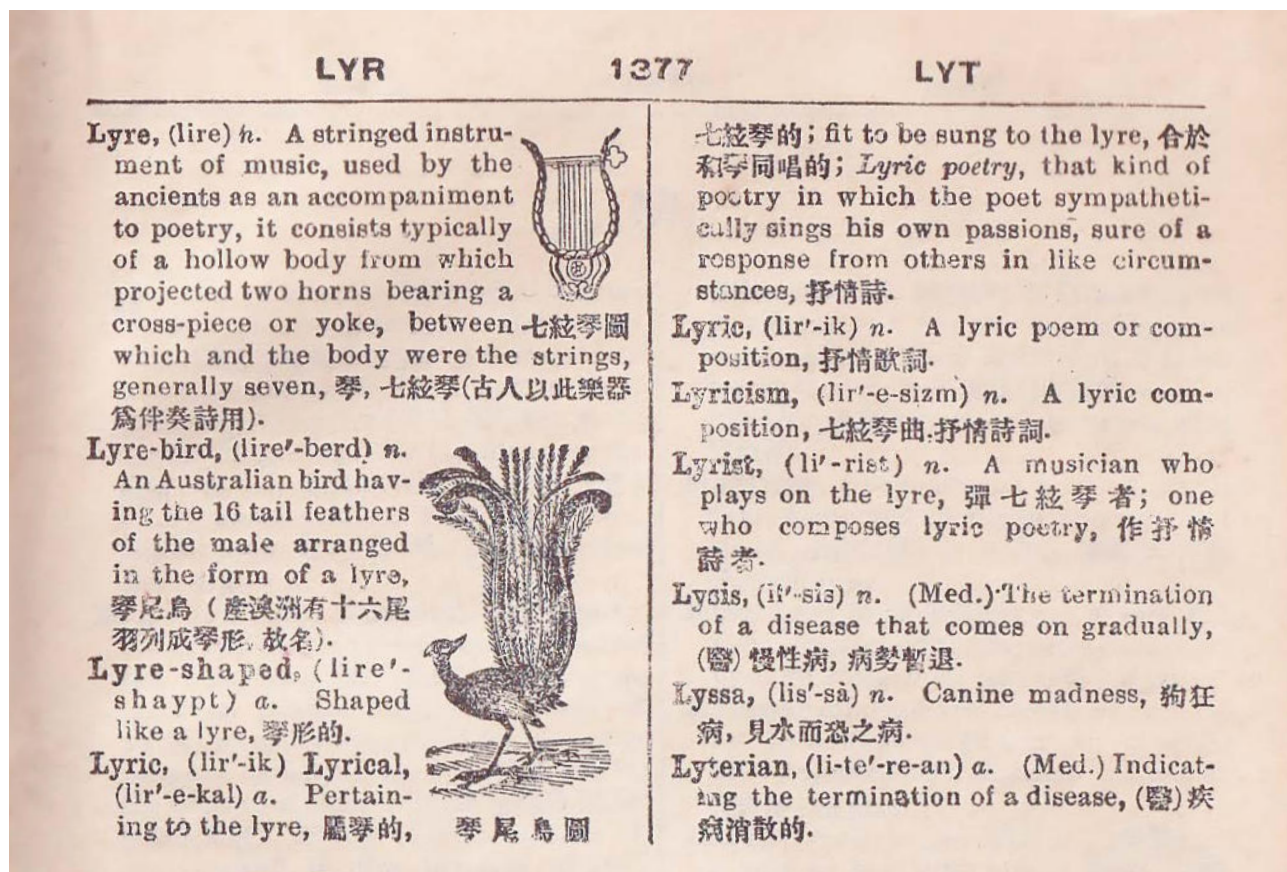


圖 2. 《英華大辭典》節取內容（圖片來源：1935 年《英華大辭典》（縮本）第 1377 頁，筆者自藏書。）

《英華大辭典》附有中英文扉頁、中英文編輯組成員資訊頁、侯官嚴手書序言、卜舫濟（F.S. Hawks Pott）序言、編輯團隊英文序言、顏惠慶中文《英華大辭典》序、略字（縮寫）中英列表、英語詞性（Parts of Speech）略寫表以及辭典正文。辭典正文內容按英文字母順序從 A 到 Z 排列。每個單詞註有單詞拼寫、音標、詞性、單詞英文解釋及中文註釋、詞組及詞組的中文註釋，部分單詞、詞組還配有插圖（圖 2）。

三、宣統帝英語學習概況及英語教材

與光緒帝相比，宣統帝溥儀的英語學習則“隨意”很多。溥儀的英語老師莊士敦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根據溥儀在《我的前半

生》中所述，他的英語學習是李經邁的建議，經徐世昌代向英國公使館交涉，最終聘請莊士敦來為其教學。²¹ 因此，溥儀學習英語的動機較為被動，與光緒帝“主動要求”形成反差。溥儀的學習態度屬於“一曝十寒”式、“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型，經常缺席、請假，而莊士敦也不像中國老師那樣嚴格，會縱容溥儀的貪玩。溥儀自述道：

當他乍一來教書時，因為他是一個外國人的關係，我每天還是按照預訂的時刻到毓慶宮去學習英文。後來日子多了，彼此也熟悉了，我那“翹課”的老毛病又復發，甚至也有時讓他“放假”一日，他也無可無不可地作了通融。²²

故宮遺事

起初我聽得還有味道，不過只有一會兒工夫我照例又煩了……莊師傅……等着我玩鼻煙，一直等到下課的時候……於是我就跑到跨院去了。這位蘇格蘭老夫子於是又守着糖果盒子等在那裡，一直等到下課。²³

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中敘述道，溥儀對學習語言並不十分感興趣，他們常常用中文討論國際時事、政治、自然科學等話題，把授課的時間都佔去了。²⁴ 由於莊士敦是“中國通”，能用中文無障礙交流，且他的教學不注重英語語言的學習，對待溥儀學習上偷懶的行為十分寬容，而溥儀本身又不夠勤勉，因此溥儀的英語停留在較為初級的水準，能大致閱讀普通的英語會話和英文四書（須中文老師協助理解），但是無法讀懂英文報紙和一般的英文書籍。在學習英語的期間，溥儀喜歡說話時摻雜些英語單詞，比如“威廉姆（溥傑的名字），快給我把 pencil（鉛筆）削好……好，放在 desk（桌子）上！”²⁵ 從這個細節也可以推斷溥儀尚不具備用完整流利的英語進行對話的能力。但與光緒相似的是，溥儀的英文書法十分漂亮，受到了莊士敦的褒獎（圖 3）。

根據溥儀自述，他從 14 歲起開始上英文課，在三年的英語學習期間，只念了兩本書，一本是《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ce in the Wonderland*），另一本是譯成英文的中國四書。莊士敦對溥儀的教學重點不在於學習英語，而更加注重教育他像個英國紳士。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沒有具體說明所讀的英文的中國四書是由哪位譯者編著或哪個出版社印製，但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中展示溥儀的英文書法時曾提到：“寫的是抄錄我譯的《孟子》一書中的若干段。”²⁶ 由此可猜測溥儀所用的英文四書很可能是由莊士敦翻譯的，並非是出版社編審出版的正式教材。

除了《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和英文的四書，莊士敦常拿一些外國畫報給溥儀進行講解，溥儀對於報刊、雜誌的內容十分感興趣，例如飛

機、坦克、大炮等。他曾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

可是畫報上的飛機大炮、化學糖果和茶會上的禮節所代表的西洋文明，還是深深印進了我的心底。從看歐戰畫報起，我有了看外國畫報的愛好……²⁷

溥儀於 1925 年遷到天津的張園居住，謝小華從天津的英商中國圖書公司 1928 年寄給溥儀的訂閱期刊帳單中發現，溥儀訂閱了許多外國刊物，包括《畫刊》《電影世界》《倫敦新聞》《三藩市紀事》《亞洲雜誌》《地理雜誌》《每日速寫》《天體學》《攝影雜誌》等，溥儀還是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會員，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經常給溥儀寄來《國家地理》雜誌和各種宣傳品。除了日常閱讀消遣，溥儀訂閱中外報紙也為了從中收集情報，包括《泰晤士報》等。²⁸ 由於溥儀自己不能流利地閱讀外文報紙，需要專人為他翻譯。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自己常聽鄭孝胥講解英國《泰晤士報》如何評論中國局勢等，從這個細節也可推斷出溥儀需依靠他人複述了解外文報刊的內容。除了上述報刊雜誌，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還提及一本美國雜誌《老爺雜誌》，他常把自己裝扮成《老爺雜誌》中外國貴族的模樣。

不論從教師的教學方法還是從教材的使用來看，溥儀的英語學習與光緒相比顯得“非正式”許多。雖然他只學習過《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和英譯四書兩種英文教材，但是不論是出於興趣或是政治目的，他有機會接觸許多涉及不同領域的原版的報刊、雜誌，包括政治時事、時尚、藝術等等，這些多元的真實的英語素材（authentic materials）都成為他了解西方世界的重要渠道。

結語

本文對晚清兩位皇帝英語學習素材的整理還有許多缺漏，其目的並非對比光緒和宣統帝誰的英語學習更有成效，誰的教材使用更值得

Mencius held converse with king Hsüan of Ch'i "Let us suppose" said Mencius "that one of Your Majesty's servants, who is about to start on a journey to Ch'u, entrusts his family to the care of a friend. On his return, he finds that his friend has allowed his family to suffer from hunger and cold. What should he do with such a friend?" "But him," answered the King "And suppose," continued Mencius, "That Your Majesty had a minister of justice who was incapable of controlling his subordinates. How would you deal with such a one?" "Dismiss him at once" replied the king "And if throughout your realm there is a lack of good government," Mencius went on, "what is to

圖 3. 溥儀手寫英文原稿（圖片來源：莊士敦著《紫禁城的黃昏》第 77 頁，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筆者複製提供。）

故宮遺事

借鑑，而是通過了解他們的英語學習和教材的使用，總結對今人有價值的借鑑意義。從兩位皇帝的英語學習背景可知，英語語言的工具性價值不是他們學習英語的主要目的，他們更看重和在意的賦予在這個語言上的人文價值，比如英語背後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光緒帝的英語學習雖然較為正式與系統，所用的教材也都比較權威，但由於慈禧太后的介入，光緒帝少了與外界溝通，了解外界的通道。溥儀的英語學習雖然比較隨性散漫，但是他有廣泛的獲取外界資訊的渠道，比如他的英語教師莊士敦和各國的報刊雜誌等，但是由於溥儀需仰賴他人複述外文素材的內容，因此他所了解的西方世界是加了許多層濾鏡的美好世界，認為西方的事務都是好的，從言行舉止到穿戴談吐都效仿西人。

此外，從上述教材的誕生背景可知，當時的有識之士不滿足、不依賴於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編譯的中英雙語教材，不斷思考中國的學子需要甚麼樣的教育、甚麼樣的教材，致力於為中國學子提供更高品質、價格親民合理的英語學習範本，體現了各界人士的拳拳愛國之心。其中，商務印書館對於中國英語教育和教材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晚清及民國時期，不論在英語教材編輯品質還是出版數量上始終排在首位，其原因從上述細節也可窺見一二。除了聘請名家主持、參與編譯工作，商務印書館對於教科書的出版均是精心策劃，包括了解讀者需求、版本的選用、科學性、嚴謹性、價格高低、插圖質量等。教材的進步顯示出教育的進步，這也是物質與精神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

附：本研究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材研究中心資助。



註釋：

1. [俄]拉賓·帕維爾：《清朝俄羅斯文館（十八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中葉）》，《歷史檔案》2011年第1期，第52-60頁。
2. 鄒振環：《光緒皇帝的英語學習與進入清末宮廷的英語讀本》，《清史研究》2009年總75期，第107-115頁。
3. 鄒振環：《光緒皇帝的英語學習與進入清末宮廷的英語讀本》，《清史研究》2009年總75期，第107-115頁。
4.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481頁。
5. [清]德齡著，顧秋心譯：《清宮二年記》，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9-130頁。
6. 鄒振環：《光緒皇帝的英語學習與進入清末宮廷的英語讀本》，《清史研究》2009年總75期，第107-115頁。
7. [清]德齡著，顧秋心譯：《清宮二年記》，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2-63、154、194、197頁。
8. 《同文館題名錄（第四次）》，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第41-42頁。
9. 葉曉青：《光緒帝最後的閱讀書目》，《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80-183頁。
10. 邱志紅：《〈英文舉隅〉與〈英文話規〉——同文館畢業生編譯的早期英語文法書》，《尋根》2008年第5期，第35-40頁。
11. [清]張德彝：《英文話規·序言》，清光緒年間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第2頁。
12. 參見孫廣平：《晚清英語教科書發展考述》，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歷史系，2013年。
13. 轉引自張英：《啟迪民智的鑰匙——商務印書館前期中學英語教科書》，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04年，第67頁。
14. 《重譯者識》，載《華英初階》，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封底。
15. 《華英初階》，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第4頁。
16. 《書信》（“Letters”），載《華英進階·三集》，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第177-179頁。
17. 參見[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概述》（“General Introduction”），載《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2年，序言頁。
18. Wong Tsz, "Decoding the Translations of Political Term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Lobscheid and hi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vol. 1, no. 2 (2017), pp. 204-215.

19. 參見辜鴻銘 (Ku Hung-Ming)：《序》（“Introductory Notes”），載《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2年，引言頁。
20. 參見顏惠慶等編：《英華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21. [清]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9年，第97-98頁。
22. [清]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8年，第130頁。
23. [清]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9年，第97-98頁。
24. 有關內容詳見[英]莊士敦 (Reginald Johnston) 著，高伯雨譯：《紫禁城的黃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25. [清]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9年，97-98頁。
26. [英]莊士敦 (Reginald Johnston) 著，高伯雨譯：《紫禁城的黃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7頁。
27. [清]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9年，第97-98頁。
28. 謝小華：《“皇帝”愛看報》，《紫禁城》2006年第5期，第74-79頁。

